

《國情·信念·改革》叢書

鄭憲臣 等

● 現代盤古開新天
● 走出一條地圖上沒有的路
● 中華大地，誰主沉浮？
● 毛澤東和蔣介石握手
● 32 億買了個階級
● 鄧小平說：“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華脊梁

中國共產黨70年素描

國防大學出版社

中华脊梁

——中国共产党70年素描

郑宪臣 姜 波 郭幼茂
钱湘弘 曹志贤 曹冬才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20号

中 华 青 梁

——中国共产党70年素描

郑宪臣 姜 波 郭幼茂

钱湘弘 曹志坚 曹冬才

•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4.25印张 86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北京)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626—0353—7/D·132

定价: 2.40元

国情·信念·改革丛书编委

主编：张应生 李作民

王春言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肖季文 季云飞

陆水明 林 凌

顾林元 顾勇华

徐建清 徐洪亮

徐 舸 曹志贤

潘望喜

题 记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70年风云搏击，您是中流砥柱。

往昔岁月，您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冲破了多少迷雾迭嶂。有了您，中华民族才有了百年一胜的扬眉之战，才有了天安门城楼那庄严的宣告。

在新的征途中，您不断地超越自我，一次次地跳出“历史周期率”。有了您，中国人民才有了42年的辉煌，才有了13年建造起另一座丰碑的伟绩。

历史已昭示：没有您就没有新中国。

现实将证明：没有您就不会有民富国强。

在改革开放大潮涌动的中国，您仍是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目 录

开天辟地·····	(1)
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	(15)
北伐先锋·····	(25)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32)
走出一条地图上没有的路·····	(43)
奇迹般地打开了新局面·····	(51)
中华民族的脊梁·····	(64)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握手·····	(80)
天翻地覆·····	(86)
32亿买了一个阶级·····	(95)
艰辛的探索·····	(102)
十月的胜利·····	(109)
伟大的历史转折·····	(114)

开 天 辟 地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外人控制，清王朝政权腐败透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曾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面临着被毁灭的悲惨前景。

如何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落后的封建专制，使国家走上繁荣富强？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但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没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运动，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耻辱进入了20世纪。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又响起了枪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一个月内，全国24个省区中，有14个省市起而响应，革命派三分天下有其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两个多月后，末代皇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宣告结束。

历史把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交给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但它却无力完成这一使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出世就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之中，表现出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勇气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起义的领导者就向各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所有清国前所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又有人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非袁世凯担任总统不可。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意志坚强的革命先行者，但在内外压力之下，他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前，也不得不向握有重兵的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致电表示，只要袁世凯承认共和，自己就当即辞职，把总统让给他。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炮口下，民族资产阶级终于低下头来，把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拱手交给了帝国主义中意的袁世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仅存3个月便夭折在襁褓中。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象一声春雷，惊醒了东方的睡狮。它以巨大的吸引力，把中国先进分子的视线由西方吸引到俄国。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榜样中，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研究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迅速掀起。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

的第一人。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889年生。早年，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后东渡扶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1916年回国。他在1918年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后，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他于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之为“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全体人类的新曙光”，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他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就资格而言，它比中国资产阶级还要老些。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短暂的迅速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深刻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中，当大批爱国学生被捕、学生斗争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1919年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也举行罢市。斗争

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至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进一步倾向于社会主义。如果说在五四运动前，中国还只有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么，五四运动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则逐渐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潮流。在五四运动后的半年之内，全国新出版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就有200多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纷纷出现。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杂志主编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专门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本人在“专号”上发表了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阐述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这时也开始批判资本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年长李大钊10岁，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县，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杂志，名声鹊起。

《新青年》从一问世，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死寂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它标志着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兴起。陈独秀成为向封建势力冲锋陷阵的旗手，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当再走“欧美、日本的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表明，这时陈独秀已从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这时也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以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1918年8月，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

产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其他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巨大政治声势、特有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为斗争的主力，为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先进的知识分子由此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中国的改造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于是他们纷纷到工人群众中去，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宣传革命道理。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使自己的立场真正转到了工人阶级一边；一部分工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后，使自己具有了阶级的觉悟。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出现了，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不知何人于

1920年1月在报刊上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呼唤。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反动当局拘捕，后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他应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李汉俊之邀，前往武汉讲学。讲学完毕，返回北京。就在这时，反动当局作出了再次逮捕他的决定。当他乘坐的火车将到北京而尚未到达之际，反动军警已守候在他的住宅内。就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李大钊预先率人赶到车站，把陈独秀接走了。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到天津。二人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别进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故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称。

1920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一批先进分子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1920年5月，作为建党第一步，陈独秀组织起了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到北京。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创建于1919年3月。我国的五四运动，震惊世界，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关注，遂作出派魏金斯基5人来华访问五四运动领导人的决定。

魏金斯基一行5人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他们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建党条件已经成熟，建党工作应立即展开。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本有建党意图，魏金斯基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

二人一见如故，在建党问题上不谋而合。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积极开展建党的筹备工作。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建立，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担任书记。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

上海小组担负着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重任，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它有直接的联系，有的则是它直接推动的结果。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登高一呼群山应”。南陈北李双双建党的消息一传开，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备受鼓舞。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还在日本东京建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也在法国巴黎建立了旅欧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6月，共建立了8个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名称是不一致的，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共产主义小组”是后人为区别于正式成立的全国的党组织而习惯地称呼的。

随着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及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速了建党的步伐。

1920年8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为驻华代表。翌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到达上海，他是来接替魏金斯基的。

马林与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后，即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此时的陈独秀，已应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小组的书记先由李汉俊后由李达担任。当马林听了李达、李汉俊介绍的中国各地建党的情况后，当即建议马上召开党的成立大会。李达便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去信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欣然赞同。于是，李达、李汉俊便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来沪开会。考虑到旅欧小组远在巴黎，无法及时收到信件，没有通知他们。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的通知后，迅速选派出自己的代表，秘密向上海进发。大会原定6月20日召开，但代表们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齐。

公元1921年7月23日，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终于迎来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这天晚上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拉开了序幕。

大会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公馆楼下的客堂里。参加会议的人员是来自7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的代表王尽美、

邓恩铭，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旅日小组的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的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陈独秀、李大钊皆因公务繁忙不能抽身，未能出席大会。

代表们先后到达会场，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室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其未能出席会议，临时改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作记录。

张国焘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以及选举中央机构等大会应解决的问题。然后，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致词，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它使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之后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可尔斯基第二次出席了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刚开始，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会场。当李汉俊问其找谁时，他说找社联的王主席，并说找错了地方，表示歉意后匆忙退出。会场附近，确有个“社联”，但这个组织里既无姓王的，也没有设主席。这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当即表示此人可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分头散开。会议

被迫中断，代表们即刻散去。李汉俊是房子的主人，不便离开，陈公博要与他作伴，二人留了下来。

20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李公馆。几个巡捕带着中国警察进屋搜查。但除了搜出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什么可疑之物也没有查到。抽屉里倒是有一份党纲草案，幸亏涂改得很乱，没引起他们的注意。

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改变开会地点。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议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开会。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7月31日上午十时，代表们乘火车分两批赶到嘉兴南湖，登上事先准备好的画舫，以游客的身份掩护，在霏霏细雨中开始了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计划，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要求“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不是单单注意马克思主义宣传，而且十分注意同本阶级